

從書

之
二

征塵錄

之二

兩廣縱隊文工團《征塵錄》編委會

一九九七·八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| 容 彬 | 一条旧标语引起的忆思 |
| 7 | 郑汉光 | 我当交通仔的故事 |
| 17 | 王 冲 | 风雷激荡渡中秋 |
| 20 | 王 冲 | 深山密林过除夕 |
| 25 | 傅 冰 | “三龙”政工队战斗在水乡 |
| 40 | 陈正光 | 抗日时期敌工工作追忆 |
| 47 | 罗 明 | 冒险送信 |
| 51 | 李 昭 | 小小烈士碑 |
| 56 | 李 昭 | 情系珠玑 |
| 60 | 陈 冲 | 在粤北的一支短枪队 |
| 67 | 谭 军 | 在香港隐蔽的日子里 |
| 77 | 王 冲 | 救命之恩永记在心头 |
| 84 | 王 恒 | “两广纵队战友们，你们好！” |
| 98 | 华 英 | 难忘啊，山东父老乡亲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16 | 史 野 | 司令员与文艺战士的故事 |
| 128 | 高 杨 | 在两广纵队文工团的日子 |
| 141 | 孙 茵 | “老管”和“马邓”的一夕谈 |
| 146 | 陈正光 | 淮海战役杂记三则 |
| 149 | 陈 全 | 夜渡黄河 |
| 152 | 陈 全 | 手风琴的故事 |
| 155 | 陈广杰 | 打开济南府 活捉王耀武 |
| 159 | 杜远虹 | 跨过罗湖桥 走向新生活 |
| 165 | 谭 碧 | 我回到温暖的家 |
| 167 | 汤 牧 | 港口纪事 |
| 171 | 陈 韞 | 忆往昔趣事 |
| 179 | 孙 茵 | 真实·真挚·真情 |
| 183 | 杨 琳 | 两纵文工团给我无限温暖 |
| 187 | 杨 萍 | 缅怀往事永难忘 |
| 191 | 谭启申 | 在军分区宣传队 |
| 196 | 陈慕影 | 我深爱文工团 |
| 203 | 莫敦迟 | 一个战士的军礼 |
| 207 | 谢 亨 | 星光点点 |
| 213 | 陈 冲 | 大海唤起的美好回忆 |
| 217 | 陈 冲 | 风雨渡海陵 |
| 219 | 吕应权 | 一个团外战士的回忆 |
| 223 | 邓鹤年 | 新兵纪事 |
| 234 | 甘征雁 | 我调到一团供给处以后…… |
| 248 | 谢 亨 | 龙穴岛演出 |
| 251 | 谢 亨 | 下连锻炼小记 |
| 253 | 陈 埃 | 我的小家当 |
| 257 | 叶 平 | 你还记得吗？ |

- 259 韦 丘 我和李昭
- 288 何成炼 信念不变 追求不改
- 296 刘 汉 耍蛇人自述
- 303 陈克衡 人 生
- 331 黄 沙 我走过的路
- 348 孙 茵 曾良与鹰
- 353 张 拔 青春无悔
- 358 谭启申 无愧的呐喊
- 365 李弘峰
- 谢 亨 坎坷一生无悔恨 鞠躬尽瘁育后人
- 372 陈 埃 兜兜转转三十年
- 381 黄锦端 乔毅大姐在我心中
- 383 高 晶 我们三队的“阿庆嫂”——李碧仪
- 387 刘 汉 画家与海基会对话
- 401 王 冲 我与青少年的忘年交
- 407 李碧仪 大洋彼岸的思怀
- 411 李稚英 四十六年后重游万山有感
- 416 肖汉平 终身难忘的两件事
- 421 任克等 战友情深（18 则）
- 434 张松鹤 迎香港回归感怀（外四首）
- 441 乔 毅 思 念
- 444 何 胜 乡 居（外六首）
- 451 汪 潮 词五首

- 455 陈 埃 两纵文艺战友重聚（外一首）
 457 莫敦迟 敬酒歌（外一首）
 460 罗 明 与少年队共歌
- 461 容 彬 两广纵队文工团大事记略
- 474 程天亮 文工团具有强大的凝聚力（代后记）

画 页

- 张松鹤 鲁迅塑象
 王作尧将军塑像
- 刘 汉 拓荒牛
- 张拔等 红楼梦——金陵十二钗
- 曾 良 斗
- 涂 夫 老来红
- 陈耀生 千舟已过万重山
- 李 昭 花卉小品
- 王文瑞 竹
- 樊 明 罗浮山东纵司令部

容 彬

一条旧标语引起的忆思

1993年12月，我随广州地区的东纵北江支队、西北支队的老战友到英德市参加东江纵队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。在火车上，原北支主力大队长郑伟灵同志对我说：“容彬，英德鱼湾还留下你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一条标语，我们这次要去看看。”听后我感到十分诧异与兴奋，真想不到48年前写的标语竟能保存到今天。火车到了英德站，只见车站广场上人潮涌涌，红旗飘扬，锣鼓喧天。市领导以及许多北支、西北支的战友及老区的群众，前来欢迎我们这些当年在北江两岸浴血奋战的老游击战士。在驱车前往驻地的马路上，见一条条写着“纪念东江纵队成立50周年”的红色大标语横空而挂，交通岗上英姿飒爽的女民警见车队通过肃然立正敬礼，路上行人面容兴奋，整个小城呈现节日气氛。

次日参加纪念大会，见到许多阔别数十年的老战友，大家激动得紧紧握手、拥抱、互叙别情。谈起当年的战斗，一个个眉飞

色舞，忆念起牺牲的先烈，不禁老泪纵横。好几位当地的北支战友向我提起那条标语，要陪我去看。

大会后，市委组织我们去老区访问。我们的汽车经过望埠，在石脚下越过了温塘山脉，到东乡的大镇、江古山、桥头、鱼湾、青塘等老区乡镇访问。记得45年3月，我主力大队夜袭望埠联防大队，消灭伪军数十人，俘虏了伪联防大队长后，当晚部队撤回温塘山下的石脚下，据守百段石。次日黎明，日寇300多人向我报复，鬼子十分狡猾，先头部队化装成村民农妇，妄图偷袭，但我部队识破，予以猛烈的火力回击。敌人依仗其人多、装备强的优势，用小钢炮、重机枪密集的火力向我们攻击，妄想攻上百段石，扫荡我初建的东乡抗日根据地。我部居高临下，坚守阵地，勇猛阻击，奋战大半天，终于击退了日寇的进攻，消灭鬼子30多人，首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，保卫了抗日根据地。想当年的百段石山路是多么的陡峭险峻，从山脚爬到山顶、到东乡要整整一天时间，而今汽车在平展展的山间公路飞驰而过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东乡的大镇。在桥头，昔日的革命摇篮——英东中学、桥头小学的师生和许多乡亲夹道欢迎我们。看到那一队队朝气蓬勃，神采奕奕的少先队员，敲着小鼓、吹着小号向我们挥手欢呼；那些满头银发，扶着拐杖，颤巍巍地前来和我们亲切握手的老爷爷和老奶奶，我们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：“感谢你们！老区的人民。”

汽车到了鱼湾白围，迎面看见一道白墙上赫然出现一条褪了色的大标语——“不分党派，不分阶级，团结起来，一致抗日”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北江支队制”。同志们顿然情绪昂扬，心潮澎湃，人群沸腾起来。郑大队长拿着话筒介绍：“这条标语是1945年3月北江支队铁流政工队容彬同志写的，他就在这里。”于是许多同志围着我问这问那，一位当地独立第一大队的老战士从人群中挤向前来，抱着我叫：“呵！是容彬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
清远市、英德市的记者立即向我采访，许多照相机，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我，我一时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之感。我忆起48年前随北江支队铁流政工队从罗浮山出发，经清远湟江挺进英德，来到支队长邬强同志的故乡，大革命时期的老区鱼湾，受到老区群众热烈欢迎，欢呼“我们的红军回来了”的情景，如今又仿佛出现在眼前。记得我们在北上行军途中，队长交给我和梅英同志负责在沿途村镇写标语，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，扩大部队政治影响的任务。一路上我们提着桶子，拿着刷子，每逢部队休息的时候就找空墙刷标语。标语的内容都是由政治处拟定的，如：“团结一致抗战到底”、“实行减租减息”……等等。因此在英德东乡的一些村镇的确留下了我们写的不少标语。但这一条是否我写的，我不敢确认，因为当时写标语的不只是我们的铁流队，还有后来的马达政工队，青干班的同志也写了不少。引起大家关注的不在于这条标语是谁写的，而在于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劫难，老区人民是怎样把它保存下来的；以及这条标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。据当地的“独一大”老战士介绍：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军第一五二师从江西三南地区来到英德东乡抢夺胜利果实，进攻鱼湾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我部撤离乡镇转移到深山打游击，老区人民重陷水深火热之中。但群众与我军情同骨肉，心心相连，他们不但千方百计掩护我军留下的伤病员及地下工作者，而且为了不让敌人破坏这些标语，细心地用石灰把它复盖起来，然而标语的内容已深深地铭刻在老区人民的心坎上。当他们知道东纵老战士来访的消息后，立即仔细地把复盖的石灰层括掉，使这条标语重见天日。

回想起来，我们的标语所宣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开始时不少老区人民是不理解，想不通的。记得有一位参加过大革命、土地革命的老犁头会会员、英勇的红色农军战士朱光槐同志，他于1931年鱼湾暴动失败后，组织10多个农军战士，钻进

鱼湾后面坳头山的密林中打游击，曾经打垮了上山进剿的敌军一个营，击毙了敌军马营长。由于找不到党的领导，有家归不得，年长日久，只好当起山大王，经常下山到漓江打那些国民党和地主豪绅的运粮货船，劫富济贫。当地群众亲昵地称他“匪地光槐哥”，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，叫他“三山猴王”，出重金买他的脑壳。就这样他自觉地斗争了十多年，终于迎回了亲人“红军”，并参加了北支独一大，当了一名班长。这位老人家曾向我提问：“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农民兄弟，是我们的死敌。为什么我们党提出‘不分党派，不分阶级’呢？我们对国民党、地主、恶霸有深仇大恨，不能和他合作”。我在温塘山脉中的仙沐塘村做民运工作时，也有一位老犁头会员阿银伯（后来参加了粤北地区农民自发的邦会组织洪门）对我说：“中央军在我们家乡杀人放火做尽坏事，我们的洪门还在香炉底下刻有‘抗日倒蒋’四个字，我们拥护共产党打日本鬼，但共产党怎能和欺压我们的国民党合作呢？”对于这些老区人民朴素的阶级感情，我们十分理解，我们耐心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，指出这是党中央、毛主席的伟大决策，当前我国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。因此在抗战时期凡是主张抗日，反对投降卖国的中国人，不论他是那个阶级那个党派，我们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共同抗战，这样才可以壮大我们的力量，打败日本侵略者。但是对那些消极抗战，积极内战，专搞磨擦的顽固军队、反动份子，我们是要坚决斗争的，如果他们敢于进犯我们，我们必将坚决粉碎他们的进攻。

经过了党的广泛深入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，不但广大工农群众坚决拥护支持我们，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力量，而且也团结了许多开明士绅、上层人士和一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国民党军人共同抗日。我的一些英德籍进步同学，他们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但他们的父兄在党的统战政

策感召下以及其子弟的影响下，多数都能同情和支持部队。尤其是当时任英东地下党县委书记的林名勋同志，他的家虽然是英德江古山有名的大地主，但在他的教育带动下，他家中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出来干革命，在我部最困难的时期，他们给部队送粮、筹款、送情报，成了部队可靠的后方。我们在英东地区的县、乡镇及翁源、新丰、佛岗、曲江等县的一些乡镇召开了有各党派、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，经过民主协商选举，产生了由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实行统线政策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——抗日动员委员会。动委会担负了支援部队作战，组织抗日团体，发动青年参军参战，维持地方治安，保护人民利益，发展经济、教育事业……等等任务，从而巩固和发展了北江东岸抗日根据地。

我们党还对驻英德的国民党军挺进第二纵队开展统战工作，争取了挺二的司令莫雄中将与我们秘密合作。他属下的一个大队和二个中队，是由我党秘密控制和领导的，当北支和西北支到达英德后，经党组织研究决定，他们公开竖起了红旗，编入了我军的序列，从而壮大了我军的武装力量。

在抗日的旗帜下，我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，积极热情支援北江支队，狠狠打击日寇伪军，我们主动出击，消灭敌军据点，破坏敌人的交通线，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。在望埠、河头、石脚下、沙口、沙溪……等许多地方作战，取得了显赫的战果。而国民党顽军及其地方反动武装在日寇面前畏敌如虎，节节败退，但对我抗日军民却凶似豺狼，处处挑衅，甚至勾结配合日寇猖狂进犯我抗日根据地。我军本着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原则，坚决予以回击。曾粉碎了顽军第一五三师曾肇基部的进攻、俘虏了敌副指挥官廖毓清。还消灭了一些称霸一方鱼肉百姓，妄图进犯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，活捉了英德国民兵团副团长胡杰夫，击毙了反动区长、联防大队长

何祖华……等一批反动头子。

回想起这些纷纭往事，我深感到白围墙上的那条标语虽然只是十多个字，但它显示了当时我党我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，闪耀着这个伟大政策的光芒。

这条标语能够保存至今，大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如今我们的老区虽然已开始摆脱贫困，有的农民已逐渐过上温饱的生活，但面貌改变仍然较慢。当珠江三角洲的农村普遍盖起小楼房的时候，这里的广大农民群众却仍然住在那破旧的百年老屋里，所以那面写有大标语的墙才不致于被拆毁。听当地一些北支老战士说：“在其它山区的一些村子里，还保留着你们写的标语。”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。我希望当我们老区经济大发展，改变贫困面貌时，要注意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。

郑汉光

我当交通仔的故事

苦难的童年

我小时家中有父、母、大哥、大嫂、姐姐。爸爸是个裁缝工人，生活还可维持。1940年，我10岁时，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家乡宝安沙湾，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香港新界，过着离乡背井、流离失所、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。不久爸爸病倒了，没钱求医买药，几天就去世了。爸爸一死，家里失去了主心骨，母亲只好含泪带着子女们回到破碎的家乡，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。大哥租了一部单车载客谋生，大嫂给地主当雇工，姐姐嫁到外地去，我到大屋村给财主放牛，母亲在家带一岁的孙子志明仔。那时村外炮楼里的日寇经常到各村抢掠。有一次鬼子兵闯进我村，牛主逃难去了，留下我看屋。一个凶神恶煞的鬼子抓着我吱哩咕噜的

问话，我听不懂，有个汉奸恶狠狠地说：“皇军问你游击队那里去了。”我说“不知道”，鬼子用大皮靴踢我的屁股，还用烟头烙我的手背，我痛得大喊大叫。鬼子找不到游击队，抢掠一番就撤走了。从此我恨死那些鬼子和狗汉奸。

不久的一天，我在河边放牛，对岸一个妇女喊我：“汉光，刚才鬼子进了你村，听到你家响了几枪，你娘不见了，快回家去看看。”我吓坏了，赶紧跑回家中，见到志明侄躺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却不见妈妈的踪影，我满屋满院地找，找不到，就抱着志明坐在门槛上大哭起来。傍晚，大哥踩车回来，听说妈妈不见了，和我拿着电筒到处找，终于在院外一个厕所里发现妈妈满身鲜血淋漓卧倒在粪灰里。哥哥和我把妈妈从粪灰中抱起来，我扑在妈妈身上哭喊妈呀！哥哥摸摸妈妈的鼻子，眼泪直往下流，他强忍着哭声，咬着牙说：“阿弟，别哭，妈死了，要记着她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。”从此鬼子的这笔血债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。

妈死后，哥哥又离开了家，嫂子把志明接走了，我继续给财主看牛。大约过了一年多光景，嫂子因病、饿、累死了，丢下了志明仔，哥哥又不知去向，我带着志明无法放牛，只好去讨饭。夏天我们还可以到田里挖农民挖剩的蕃薯花生充饥，最艰难的是那北风凛冽的寒冬，我俩衣衫褴褛，拖着一双冻僵了的赤脚，哆哆嗦嗦地走到乡亲的门前喊一声：“大伯、伯娘，有无粥给我们吃一口吧。”好心的乡亲知道孤儿汉光来讨饭，就会给我们一两块蕃薯或一碗稀粥，可是遇上那狠心的财主，却放恶狗来咬我们，所以我随身带着一支打狗棍。春节那一天，财主家大摆筵席，把吃剩的骨头扔到门外，我们赶快去捡，这时财主家里突然冲出一只大黑狗向我们扑过来，我举起棍子狠狠揍那恶狗，抢过骨头，拉着志明快逃。就这样我们又熬过了一个苦难的冬天。过了年，大哥回家来看我们，见我们太苦了，就托付同乡收养了志明仔，安排我给大舅家看牛后，又走了。这一年多，我和大哥失

去联系，心中急死了。后来有个乡亲偷偷告诉我：“你大哥当了游击队，打鬼子去了。”我一听乐了，亲爱的大哥呀，什么时候你也带我去当游击队打鬼子，我们要给妈妈报仇呀！

有一次我在打鼓岭河边放牛，一个青年见到我急叫：“小孩快走开，这里危险。”我不知怎么回事，一面走一面回头看，只见河对面有些人在捕鱼，山边有些妇女在锄地，这时一队鬼子兵来到河边上了木桥，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，原来鬼子兵中了化装成渔民和农妇的游击队的伏击，被打得人翻马仰，狼狈奔逃。呵！游击队，我哥哥一定在里面呀，可是枪声一停，游击队全撤了，我见不到大哥。从此我经常去河边放牛，希望再见到游击队，但总没碰上。正当我十分失望之际，一个乡亲跑来叫我：“汉光，快回家，你哥哥回来了。”我赶紧跑回家见到大哥，他长得那么高大威风，脸膛黑里透红，一见面笑呵呵地说：“阿弟，走，当游击队去。”我乐了，问：“打鬼子吗？有饭吃吗？”“有，参加东江纵队，打日本鬼子。”我高高兴兴地跟着大哥上路了。一路上大哥告诉我他早在妈去世时就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，还讲了许多打鬼子的故事，又说：“到部队后首长问你几岁，你就说16岁，年纪太小部队不收的。”其实那年我才14岁呢。

革命部队是我的家

到了部队，哥哥带我去见彭沃支队长和陈一民政委。陈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：“什么名？”“郑汉光。”“几岁啦？”大哥抢着答：“16岁，”政委笑了：“16岁？我看他只有十二三岁，找这么小的人来当兵？！真是多余！”我急了，赶紧说：“是16岁，就是长得矮一点嘛。”政委笑了：“好吧，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孤儿，以后革命部队就是你的家啰。”从此同志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“多余”。彭沃支队长说：“郑汉光，你哥哥在支队部当副官管财务，

以后你就跟着哥哥当小鬼，给他背钱袋吧，好好干革命。”他又通知特务长发给我一套列宁装和一顶鸭舌帽。我穿上新军装虽然太大了些，上衣把屁股全盖住了，可是我感到自己非常威风，棒极了，要是爸妈活着见到我这样该多高兴呀！

我们支队部有几个小鬼，大家一起生活、工作，十分愉快。我个子最小，年龄也最小，从首长到战士，人人都很关心我、爱护我，尤其是几位首长，工作那么忙，还经常教我学文化，教我革命道理。我自从父母死后受尽折磨凌辱，到了革命部队后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家，我为自己成为一个革命战士而感到自豪。

1945年春，我随部队渡过东江，到了博罗罗浮山根据地，驻在柏塘圩附近。这里是新区，部队每逢圩日都要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。这时支队政治处组织股长江鸥明对我说：“多余，给你一个任务，每逢圩日到柏塘卖纵队的机关报《前进报》，做抗日宣传工作。”我文化水平低，看不懂报纸，于是他就把每期报纸的重要内容告诉我，叫我卖报时宣传。我高高兴兴地挎着报纸袋到圩场上高喊：“卖报卖报，东江纵队的前进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……”许多群众围上来，我就把主要标题念一遍，报纸很快就卖光了。从此，我成了革命部队的小报童，红色的宣传员。

由于我性情活泼，喜欢唱唱跳跳，政工队把我挑去演戏唱歌。我虽然不识字，不识简谱，只能跟着同志们唱，却很快学会了，参加了演出，大同志们都很满意我的表演。可是政工队任务繁重，演出机会不多，常要做民运工作或下连队，这些工作对我都不大合适，所以不久就调离了。

后来哥哥当了支队部交通总站站长，首长就调我到交通站当交通仔。

在惊险的交通线上

我所在的交通分站设在龙门县河西坑村一个贫农温祥的家中。站内有分站长唐富、交通仔李木金和我三人。温祥有妻子、8岁的儿子，6岁的女儿和一位老妈妈。他们对我们好像自家人一样，非常亲热。平时我们白天在站里休息或帮祥哥干些农活，晚上就去执行任务。我们通常的任务是送情报或给来往部队的人员带路。哥哥的总站设在一座大山沟里，他经常教导我们：“交通线是部队的血脉，交通线断了，部队间失去联系，打仗就会受损失，所以交通员执行任务要坚决、勇敢、机智、谨慎，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。在最危急的情况下，必要时就把信吞到肚子里，总之就是自己牺牲了，也绝不能让信件落在敌人手中。”

我第一次执行任务，是到河家田大队部接受曾政委交给我的送信到20多里路外的一个中队去的任务。那时是傍晚，曾政委把信卷成像火柴般的一小条，塞在我的衣缝里，告诉我：“从河家田出发直上前面的鹅头寨山，下山后见到一条小村庄，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直进村的，这路你不要走；你要走另一条，沿着村边小溪走约半个多小时，到了一片树林里，听到哨兵喊口令，你就答‘东江’，如果对方答：‘抗日’，那就是自己人了。”他又特别交代：“你一定要把信亲手交给中队长和指导员。”我接受任务后，沿着一条陡峭崎岖的小径摸黑快步上山。点点繁星映着我前进，山野间万籁俱寂，偶尔几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黄猿啼叫和凄厉的夜鸟啼鸣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在这漆黑的山林里，地上一些腐烂的败叶闪烁着绿色的荧光，空中飘荡着磷火，这对于我一个孤单的孩子是多么的可怕呵，我的心发毛起来。但当我摸到衣缝里的密信时，想起首长的嘱咐，浑身又充满了力量。我大步翻过山顶，飞快下山，借着稀疏的星光，远远地看见一片黑呼呼的